

东方语言 与文化

DONGFANG YUYAN
YU
WENHUA

潘悟云 主编

©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语言 文化

DONGFANG YU YAN
WENHUA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语言与文化/潘悟云主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2.3

ISBN 7-80627-757-9

I. 东... II. 潘...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868 号

东方语言与文化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3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757-9/H·76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汉语言学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史研究专题学术论文一十七篇。其内容包括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研究,汉语语音的上古来源,汉语方言音调的变化发展,汉语史的分期讨论,汉语的语法化过程,小称变调的来源,词序的普遍现象,南方方言的若干语法现象及其历史根源,音变规律性的解释及方言的语音实验,语言中遗留的原始思维方式,西方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中国科举制度对汉语史的影响等。论文的作者均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计算机统计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具有前沿性和代表性。因此,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精品图书。

编 委 (按拼音次序排列)

曹志耘	陈忠敏	刘丹青	陆丙甫
麦 耘	潘悟云	钱乃荣	沈钟伟
石 锋	施伟达	王洪君	汪 平
徐文堪	游汝杰	张洪明	朱晓农

编 者 的 话

语言的产生,无疑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有了语言才有可能形成社会,才能产生文化,才会出现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在科学与文化领域中,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不与语言发生关系。但是人类对自己语言的研究实在非常肤浅,对人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所知更少。

推动语言史研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语言史观的变化。明朝人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时地观念,导致有清三百年古音学的繁荣。在威廉·琼斯指出梵语、拉丁语、希腊语之间的同源关系之后,才有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辉煌成就。最近一段时期,一些新的语言史观的出现,正是历史语言学新发展的契机。

第一,19 世纪历史语言学中的谱系说,是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相平行的理论,这个理论显然与人类起源多元说相联系:不同地区各自独立发展出的不同人种,语言之间自然没有亲缘关系。但近年来,由于人类学、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现代人来源于非洲的假说。尽管对这种假说还有争议,但是它对传统的谱系说毕竟是严重的挑战。如果这种假说成立的话,原来不可能存在同源关系的语系之间就可能同源词的存在,这无疑会大大扩大历史比较的视野。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已经在扩大汉藏语的历史比较范围,如 Sagart 把汉藏语与南岛语联系在一起,Starostin 把汉藏语与高加索语、叶塞尼亚语联系在一起,Pulleyblank 认为汉藏语在 6000 年前与印欧语有关系,邢公畹、郑张尚芳更把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南亚语和南岛语

归之为一个更大的华澳语系。他们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其假说,其中有些例子也许只是一种假象,但是也不排除另一些例子反映这些语言之间可能有更原始的发生学联系,就像许多科学家为了探索宇宙的起源和发展提出许多假说,语言学家也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提出许多假说来。科学理论往往从假设开始,通过证明而完成。

第二,欧洲的语言学家曾经采用历史比较法成功地解释现代印欧语的来源,所以一些语言学家也曾经用这种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史,但是很不理想,直到最近大家才发现,其原因就是汉语的形成历史有其特殊性。历史比较法得以应用的前提是,所要研究的几种语言从同一原始语分化出来以后互相之间就不再影响。但是汉语的情况并非如此,几乎每一个方言区都不断地接受中原权威方言的影响。语言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的中原方言都不一样,每一个时代中原方言对其他方言的影响都会留下那个时代的层次。各方言也处于互相影响之中,语言之间的互相渗透,也会留下异质层次。这很像地层结构,地球历史上的一个个时代都会在地层中留下一个个层次,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就是根据每一个地层中的地质面貌和古生物化石还原史前各个时期的气候、生态和动植物的分布情况。汉语方言也可以作同样的研究。现代方言中的历史层次就是历史上各个年代语言的沉积,根据这些历史层次可以把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貌还原出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层次分析法。从汉语方言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层次分析法,将是汉语研究对世界语言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三,非决定思想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思潮之一。在 20 世纪初,物理学出现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理论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物理学从而进入到现代物理学的阶段。经典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决定论的思想。每一个物理现象的出现都有它的因,地球在某个时刻会出现于绕太阳轨道的哪一个位置,下一次月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都可以从已知的因素推算出来。但是在微观世界却不是这样,电子飞快地围绕原子核

转动,它在某个时刻会出现于哪一个空间位置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知道它在某个时刻会以多大的可能性出现在某个位置。在现代物理学中,统计的非决定论的思想取代了决定论的思想。

语言学也同样如此。语言学的主流思想一直是决定论的,所有的语言特征似乎都是确定的。王士元、Labov 把统计的、非决定论的思想引入到语言研究。在新语法学派看来,只要知道某个语言 L 的一个音 P 在某个历史时期 T 发生了音变 C,那么属于音 P 的任何一个词在 T 以后的语音形式是确定的。但是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认为属于音 P 的某个词在 T 以后的某个时间是否已经发生了音变 C 是不确定的,我们只能预测这个词在那个时候发生音变的概率是多少。在传统方言学中,一个方言的每个音位都是确定的,所以人们认为只要调查一个上海人就能代表所有上海人的发音。但是在 Labov 的变异理论看来,一个语言社团中每一个成员的读音是不确定的,我们只能根据这个成员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说话的风格、语言环境等等,讨论他的读音在语音空间中的统计分布。语言是社会的语言,所以语言的抽象是一种统计的抽象。

以 Greenberg 的研究为真正开端的现代版的语言类型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为探讨人类语言共性和本质的重要途径。类型学对人类语言共同倾向和标记性特征的探讨,以语言分布概率和文本分布概率为基础,所以其本质也是非决定论的。类型学在强调语言的经验科学性质的同时,又重新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共时状况看成是持续不断的语言演变的一个阶段。令形式语言学头痛的大量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对类型学及其相关的语法化理论来说却是根本无须回避的,因为共时的中间状态常常正是历史演变的中间状态,是探讨演变规律的很好素材。汉语一方面具有悠久的有文献可考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又有极其丰富的现代方言,中国和东亚地区还有与汉语密切相关的大量语言。同样以跨时代、跨方言和跨语言研究为特色的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结合,一定能在这片语言沃土

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把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来对待,认为它的基础和出发点决不是先验的,而是来自于经验世界,它的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经验世界的检验。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语言事实。我们将继承历史语言学的田野调查传统,在大量的语料基础上寻求语言的规律。但是,我们也反对把语言学的目标降低为纯材料的整理和描写。我们主张材料面向理论,描写面向解释,文献面向活的语言。演绎方法的引入是一切科学成熟化的标志。语言学与任何一门经验科学一样,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形式化。这只能通过对实际语言的分析,寻找语言的普遍现象,然后才有可能通过形式推理达到这个目标。实验语音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结合,是建立新的音变理论的重要途径。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所以,当我们研究语言及其历史的时候,必然要与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优秀传统。亚洲大陆上纷繁的文化现象为语言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和线索,反过来,语言学以其严密的科学性使文化史的研究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甚至连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也不断借助于语言学的贡献。史坦福大学著名的遗传学家 Cavalli-Sforza 在论及远古人类向地球各地区扩张的时候说,遗传图上的假设在找不到考古证据的支持的时候,大部分的证据是由语言学提供的。语言史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亚洲人类和文明的起源,特别是华夏民族和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因而需要有一大批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民族史专家为之共同努力。

语言学从 19 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发展到 20 世纪的共时语言学,这是语言学走向精密化的必然道路。共时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内部状态,而历时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外部运动。任何一门科学,总是既包括状态的研究,也包括运动的研究,语言学也不例外。我们以语言的历时研究为目的,但是把历时研究建立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是语言学发展的

大势。

汉语的历史研究有过非常辉煌过去,当我们采用新的语言史观、新的研究方法和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时,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本书编委会

2001年6月1日

前言

王士元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能够作为本丛书最初的迎接者之一，我深感荣幸。正如丛书书名所示，她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她将致力于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在西方的大学里，语言学开始的时候经常与文化研究共同作为人类学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1950年出版的罗常培的那部著作，是将语言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开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周振鹤和游汝杰 1986 年的著作。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研究实在太少了。

语言是文化的中心点，没有互相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重要的研究一定由有趣的问题引出，然后到一切可能的地方去寻求答案。研究者的眼光不能被清规戒律所局限和阻碍。这种障碍就像沙滩上的画线，将被每一个向前奔涌的知识浪头所推开和抹平。这套全新的丛书在促进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结合方面肯定会起很大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丛书的书名还把中国语言学的视野扩大到中国的行政边界之外。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可以立刻发现，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些边界一直是变动不定的，而且经常是多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与其北方的阿尔泰语言文化、西方的藏缅语言文化、南方的南岛语言文化共同编织成一个华丽而又错综复杂的织锦，我们把这幅画称之为东方文明。行政区域图上的线条只是纸上的墨迹，不应该让它阻碍学术研究，

或者造成学术上的偏见。

我认为,《东方语言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研究的论坛,鼓励和推进创造性的研究,从而满足了当前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最迫切的需求。我将乐观其成,并祝愿她久盛不衰。是为序。

王士王

对台某支社学大做城国美

目 录

编者的话	本书编委会 1
前言	王士元 1
探索过去的三个窗口	王士元 1
音变的有向无序性	沈钟伟 31
F0 normalis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anghai tones	Xiaonong Zhu 59
Appendix A. Description of the five Shanghai tones	84
香港粤语长短元音的听辨实验	石锋 刘艺 98
切韵四等韵的来源与方言变化模式	郑张尚芳 110
流音考	潘悟云 118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 ——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	麦 耘 147
论广州话小称变调的来源	陈忠敏 167
关中方言古全浊声母次清化及其与客、赣方言 之间的关系	张维佳 182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and Explanation in Word Order Universals Research	Randy J. LaPolla 204
赋元实词与语法化	刘丹青 238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	游汝杰 264
20 世纪初上海话和北京话中的体助词“着”	钱乃荣 282
东南方言里动词的后置成分	曹志耘 302

第三	平田昌司 327
近年于闽语及其文献研究论著评介	荣新江 360
语言中的原始思维遗存初探	詹鄞鑫 373

探索过去的三个窗口^[1]

王士元^[2]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当我们研究一种或一组语言的历史时,中心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语言彼此间在发生学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关系。^[3]通常的做法只是把 X 与 Y 联系起来,因为已经逐渐弄清楚这些当代的语言正好属于一些大的语系的一支,但这价值不大。例如,当宣称鼠和人是相关的,都属于哺乳动物时,其中包含的新的信息是非常少的。

当其能反映和代表单源族群时,发生学关系就变得有用了。用一个广泛地研究这样的问题的生物学家们的话说,“一个单源族群就是一组语言,在这组语言里,每一种语言与组内的每种其他语言,较之与组外的任何语言,都有更加密切的关系。”^[4]单源族群在通行的树形图里是较大族群的子群,而这种树形图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语言学还是在生物学里,都已经成为表示发生学关系的标准方式。

研究语言的发生学关系的中心目标,就是以尽可能精确的方式确定这些单源族群。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能够做到,就应该以不同的长度表示各个支系,从而使树形图上所有的语言的距离数量化,这样任何成对的语言之间的语言学距离,就可以在这些支系中用最短的长度表示出来。这种数量化的树形图近年来在生物学中十分成功,不幸的是尚未在语言学家中引起充分注意,尽管谱系树的观念在 19 世纪已经由语言学家施莱赫尔 (August Schleicher) 提出。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把一些语言学树

形图数量化。

如果时间跨度不是很大,又有适当的文献资料的支持,要建立发生学关系是不困难的。汉语方言正是这种情况,其分化大约开始于二千年以前。类似的有日耳曼语,在时间跨度上看来与此相当。在汉语里,书面文献资料实际上早于分化形成的具有明显界限的现代方言。至于日耳曼语,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约 1700 年以前。这样的资料为研究发生学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数据。

即使对于有悠久文学传统的语言来说,书面资料也不足以覆盖语言学家想要探究的时间深度。随着我们在时间方面的进一步回溯,资料变得缺乏,相应地语言学假设就显得不够有力。语言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学科合作,这些学科有助于阐明人类文明的遥远的过去。

分析过去可以归结为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相似。例如居住在太平洋两岸的早期居民在绘画和雕刻方面的类似。^[5]再比如可以归结为信仰系统方面的类似,就像包含在四川一些苗族中的虎崇拜那样。^[6]

我们可以想到的第三个文化类似的例子是父子连名制。这是一种显示世代顺序和由来的制度,“由此,儿子的名字总是包含着来自他的父亲的名字的一个成分,例如:盛逦皮~皮逦阁~阁逦凤~凤逦异,等等”。^[7]按 Backus 的说法,这是一种关键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确定唐宋时代古南诏国的统治者是藏缅族人,而不是像前几代有的学者所主张的泰族人。

本文标题所说的三个窗口,是指一些主导的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已经把它们系统地综合起来以用于探究史前史的三门学科。^[8]它们是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遗传学,特别是人类群体遗传学;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9]在本文的余下的部分里,我将简要地讨论从每个窗口所能看到的中国遥远的过去。

1. 考古学

在考古学方面,最近引起西方媒体关注的“新闻”是新疆东部所发现的大量干尸。^[10]这些发现应归功于王炳华和其他考古学家开始于 70 年代后期的探查。这些干尸有的年代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有的则相对来说要晚得多。因为它们在新疆的干燥的沙漠气候下保存完好,所以可以明显地辨认出是高加索种族。

同时,杂志封面的图片可能吸引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4000 年前活动于新疆的高加索种人究竟在干什么?”学者们早就知道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重要通道。^[11]中原的居民与处于更加西边的居民之间的深入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史书里已经有大量的记载,所以我们且不管其商业诱惑的性质,问题本身实际上并不是新的和令人震惊的。

另一方面,尽管在最近的将来尚不能有明确的答案,我们对这些早期居民所说的语言深感兴趣。一种说法是与吐火罗语直接联系起来,^[13]这是一种早已绝灭的语言。这些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唐代的资料是在 20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在新疆发现的。其语言现在普遍认为是印欧语。按 Baldi 的说法,“现在一般都主张说吐火罗语的居民是在非常早的时候从印欧语中心区域迁出的移居者的一部分,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 2000 年”。^[14]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不仅在地点而且在时间方面把考古学和语言学两者匹配起来。但是还不清楚在 Baldi 所接受的公元前 2000 年这一结论背后还有什么证据;也许他是跟随蒲立本(Pulleyblank)所作的推论,请参看注 11。而且,已经确知伊朗语在新疆有范围更大得多的影响^[15],直到许多世纪之后突厥语和蒙古语取代了它们。没有理由相信所有挖掘出来的个体都说同一种语言,实际情况更像是与此相反。总而言之,对这些遗体进行的遗传学研究终将更充分地阐明他们的亲缘关系。

在现今中国土地上的人类活动远远超过上文所说的 4000 年